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实行持续的封锁禁运，还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奋斗历程，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促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深入地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毛泽东思想正是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形成的理论成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没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正是经过长期实践的反复比较，党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具体实践中，在同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2. 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方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理论著作中，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并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目标。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联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到了正确方法。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3. 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为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这一时期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面对外敌侵略的特殊条件下可以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之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开创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自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

2.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领导我们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等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思想；关于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主张；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毛泽东系统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极为杰出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

4. 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其中包括：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并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统治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予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5.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个基本观点，提出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6. 党的建设理论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鉴于我们党已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他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毛泽东思想体系还包括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等内容，都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1.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把握事物内在必然联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我们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仍应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牢牢立足基本国情这个最大实际，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开拓创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2.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群众路线都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要正确行使人民给予的权力，服务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

3. 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处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合作。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五、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宽广道路，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理论本质特点的思想内容，属于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立足点。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此外，毛泽东思想的话语表达做到了理论的通俗化，以通俗的言语解释深刻道理；在表达方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毛泽东思想所体现的独特理论风格为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迪。

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2、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论断。他领导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观点，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关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思想，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关于从思想上建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思想，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追求和倡导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等，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一个怎样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和前进的历史，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人们对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为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珍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成果，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

#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1.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认清中国国情，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前提。不了解近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便不可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也就无法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1）近代中国国情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蕴含着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革命要求。

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并不能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又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尽管有了某些发展，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较大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加之受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封建社会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尽管被推翻了，但并未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整个社会呈现出典型的半封建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实际上处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加上幅员辽阔、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当时世界少有的。整个中国实际上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2）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根本转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属于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也促进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与之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近代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指导革命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指导理论，都从根本上有别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如此，这种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也大不相同，它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联合专政，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但它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不破坏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这是性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革命过程。

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需要，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次抗争和艰辛探索，每一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所有的斗争和探索终究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

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期待新的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新的革命，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产生。换言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呼唤着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它的形成包含了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辛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是通过革命的实践，经过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经过逐步地克服盲目性，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再到达自由王国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缺乏领导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之理论上的不成熟，在革命的领导权、武装斗争、革命道路等问题上没有形成科学正确的认识，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犯过一些错误，走过一些弯路。但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尤其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及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历经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趋于成熟，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总结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搞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离不开革命的实践探索，这符合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普遍原理。试想，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怎么可能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怎么可能有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怎么可能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怎么可能有党的建设的理论。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党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无法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和智慧源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总路线是相对于具体路线而言的根本指导路线。1939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路线。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最大的压迫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战乱和灾难，使近代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难祸害的总根源。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前提。

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制度，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地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革命“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靠山，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推翻地主阶级，就不能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组织起强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背靠帝国主义，通过国家垄断金融机构，滥发纸币和国债而疯狂侵吞社会财富，通过建立国家专卖制度控制大量商品和物资而大肆牟取暴利，通过超经济的特权垄断一些行业的经营权而压迫和兼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从总体上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的主要对象有所不同。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新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无产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而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的革命动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有跟在官僚资产阶级后面反对革命的危险。因此，它既不可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政治上争取它，对其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批评和斗争，又斗争又联合，这是合乎实际的，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充当领导者。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纪律性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二是它分布集中，有利于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强大革命力量的形成；三是它的成员中的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无产阶级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和优点，使其从走上革命舞台开始，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从而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实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各革命阶级的领导，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着。因此，首先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是坚持领导权的基本策略。无产阶级要保持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必须建立和发展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强大的革命武装，是保证领导权的坚强支柱；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实现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现阶段的革命是为了终结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并保护之，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有新的内容和特点，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范畴。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它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互相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三、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是表明党的性质的重要标志。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了具体阐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和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

1.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指出：“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已被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最直接、最全面地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和准则。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

2.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要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扫除封建的剥削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解放农村生产力。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是一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现代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向前发展。当然，这种保护不是无条件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

3.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就其内容说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就其形式说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及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对于封建时代创造的文化，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同时要尊重中国的历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民主的文化。文化工作者要用革命文化教育和武装人民大众，使它成为人民大众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又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创作的源泉，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总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但当时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队伍开赴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首先指向农村。在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相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1938年11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而确立了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2.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开展革命斗争，必须充分地发动农民，凝聚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否则就无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深入农村，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组织、发动和武装农民，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样是由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特殊国情决定的。党之所以能够深入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政权，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近代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存在不少的统治薄弱环节，为党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缝隙和可能。第二，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多重压迫和剥削，人民革命愿望强烈，加之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的群众基础好。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为在农村建设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客观条件。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第五，党的领导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不错误，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

3.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在于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

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比作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也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近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能够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受别的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总体上讲，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争取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才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只有建立第二个联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主要的敌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全部领导权，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完全的保障。

总结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二是要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依据革命的需要，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要针对其两面性特点，在联合的过程中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必要的斗争。三是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在革命进程中，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四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

2. 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民主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总结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经验，建设人民军队，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二要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坚持这一宗旨，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三要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由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党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和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南，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3. 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加之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且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就会组织松散、软弱涣散，不可能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不可能具备优良的作风，更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革命胜利。这些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不断地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关键是要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二，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第三，必须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第四，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是完成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的总政策，为全党的团结统一奠定政治基础。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中推进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明确的。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因此，党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没有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党的组织虽然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没有巩固；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没有掌握住。

大革命失败后，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了农村游击战争，开辟了建立人民政权的道路。党创造了坚强的人民军队，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艺术。但在这一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主张“城市中心论”，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资本主义同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而在革命战争的指导上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直接结果是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抗日战争时期，党总结了以前两个阶段的经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集中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做出的分析和研究，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事件，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力量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社会形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不断扩大国营经济，同时逐步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主要经济成分相联系，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基本的阶级力量。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既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其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及与之相联系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就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一矛盾，才能使中国社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具有两重性，既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相互对立的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相互合作、具有相同利益的非对抗性的一面。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作为可以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力量，又是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比重。由于社会主义因素居于领导地位，加上当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获得最终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决定着中国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适时地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明确。但对于何时过渡、怎样过渡的问题，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此前，毛泽东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大约还需要经过10年、15年或20年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1951年前后，党内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即在过渡的时间上，认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般估计为15年到20年时间；在转变条件上，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过渡的步骤和方式上，认为当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从1949年至1952年，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与此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及时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方式，广泛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等，为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已经完成，经济、政治及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这时，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原来的设想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我国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必要并有实现的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步骤问题。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了关于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工业的情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国就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从历史上看，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而当时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又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中国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在充分利用原有工业潜力和进行新的工业建设的同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可以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其中，“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一个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利用国家政权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逐步消灭私有制、确立公有制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渡时期，这是一切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他们还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无产阶级要不停顿地把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还曾设想用暴力没收与和平赎买这两种方式来变革所有制，并认为如果能用赎买的办法变革所有制，将是“最便宜不过了”。

列宁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转变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不但应当以独立姿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要自觉担负起领导这一革命的重任；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列宁还认为，改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和习惯势力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把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财产，同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并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事情。但由于后来俄国资产阶级选择了国内战争的反抗方式，列宁的设想未能实现。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积极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具体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适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由毛泽东审阅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二、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改造它们。”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提纲时还特别指出：我们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具体化了，形成了中国化的过渡时期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特点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农民这两方面的积极性，提出一方面不能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提倡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党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对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只能引导、说服和教育，使其自愿地走合作化的道路。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土地改革后，贫农、雇农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半数人迅速上升为中农。根据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生活状况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贫农和下中农一起，占农村人口的60%到70%，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而解决了在农村依靠农民大多数和建立无产阶级优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依靠贫下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这使农业合作化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土地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仍归农民个人所有，但在生产方面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耕畜和大农具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阶段是发展高级社。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按劳付酬，取消土地分红，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方法步骤上，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走生产合作的道路。具体来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小组。供销小组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供给原料和包销产品。它虽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已经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使之开始脱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供销轨道，因而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第二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它是由供销小组合并起来的，开始是统一供销业务，分别核算，生产活动仍由各户分散独立完成；后来逐步有部分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合作社对各户的生产也有一定的干预，因而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入社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说服教育、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使手工业者自愿参加到手工业合作社中来，从而把手工业者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1956年底，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党和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第一，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剥夺剥夺者”，使被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采用和平方式变革所有制的设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而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有利于发挥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有利于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有利于发挥民族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的知识、才能、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争取和团结那些原来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其次，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就为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并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提供了前提。最后，我国已经有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造成了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对社会主义的依赖。再加上当时国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以及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监督等因素，就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只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包括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既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些企业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这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资方红利大体占1/4，资本主义的剥削受到限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企业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第二步主要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利润的分配仍为“四马分肥”；国家派干部（即公方代表）进入企业内部，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同工人、资本家（私方代表）共同管理和改造企业，公方代表居领导地位。资本家的剥削进一步受到限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因而已经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是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和私营商业户数的8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这标志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对合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委派人员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统一调配企业的人、财、物，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

第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对资方在职人员和资方代理人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以企业为基地，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他们在政治上适当安排、工作上发挥作用、生活上妥善照顾，通过改造阶级成分的方式达到从整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改造资本家个人与消灭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相结合，既避免了激烈的阶级对抗，减少了改造的阻力，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引导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的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因此，在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使之与促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推开是从1953年开始的，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全面展开。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完成，到1957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经过“一五”期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已初步建立。实践证明，党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对于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采取了区别对象、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创造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过渡形式。这种从实际出发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改造方式，可以使农民亲身体会到组织起来力量大，可以增加生产，有利于克服困难，抵抗灾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从而逐步地提高农民的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避免出现一些农民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况。实践证明，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符合农民的特点和生产力状况。在手工业改造方面的逐步过渡，不仅保护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避免了在改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衰退。中国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都具有私有制的性质。对其进行改造，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毛泽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坚持用和平的办法，不仅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事实证明，和平改造解决了诸如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和平过渡与消灭剥削制度这类通常难以解决的矛盾。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出现这些问题，有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不够谨慎以及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等因素，也有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而产生的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经济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缺乏认识。党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曾对这些问题有所觉察，对某些失误和偏差也做过纠正，但毕竟认识不深。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遗留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和偏差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这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所做出的伟大创造。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根据

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及颁布施行，为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和保证，为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表明我国由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清除出中国大陆；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内地被消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亿万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界已经组成为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基本确立。

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够先于发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有过激烈争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曾经以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来否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批评这种观点是“庸俗生产力论”，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他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卓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用英、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邓小平结合中国的情况指出：“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

实践证明，一方面，中国可以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者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不可能超越这个阶段的。

六、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致性和能够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尽可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相继建立，工业技术水平和工程设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对于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业居民提高了28.6%。

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对此，毛泽东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它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系统回答和正确解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在“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可循，如同攀登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山，需要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成就甚为显著，经验弥足珍贵，教训十分深刻。如何回望这段激情而峥嵘的岁月？如何正确把握艰辛探索的理论成果？如何认识这一时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关系？这是本章要集中讲述的问题。

一、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实践表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仍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报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内容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着眼于调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其中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论述如何开辟一条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新思路。“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的是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呈现出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现实需要。毛泽东这里讲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既包括党内的因素，也包括党外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因素，也包括国外的因素；既包括直接的因素，也包括间接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一般来说，积极因素是处于主导的、统治地位的，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大力促使消极因素比较多、比较快地向积极因素转化，并同时尽力防止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逆转。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将“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作为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八大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和政策。

总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方针，对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2、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一定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少数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1956年秋冬，在一些农村、工厂、学校还出现了“闹事”的情况。面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也缺乏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经验。这表明，在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专门作过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开始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后来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党在八大前后，特别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他提倡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其中，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非基本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途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求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全党要学科学、学技术、学新本领。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强调：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包括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我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提醒人们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问题，认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互相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反之，有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则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论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所谓专政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内部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治罪，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所谓民主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总方针。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实践中的不同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原则：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对于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克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也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对于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方针，都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方针的具体化，为解决不同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

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论断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3、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重视国家的工业化，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难以获得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我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很多工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对此，党确定了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新中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为了弥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验的不足，学习和借鉴了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也由于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我国一度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比例失调，这就促使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思考如何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第一大关系，便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以工业为主导，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以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实现国家富强所必需的，是毫无疑义、必须肯定的。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既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又可以增加资金积累和扩大市场。这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思路，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明确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既要顾全大局，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同时，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开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在科学技术方面，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教育事业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全日制的教育制度；一种是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即半工半读）。在文化工作方面，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认为，利用行政的力量去强行禁止，不利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思想。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刘少奇提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主张，以及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陈云提出了要建立“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主张企业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责任制，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思想。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是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其中涉及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初步探索的意义

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经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是我们党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种崭新的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并进行封锁和遏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社会主义制度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第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经艰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正确地加以总结，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其艰巨性、复杂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汲取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实践形成了许多独创性成果，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三、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遭受严重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未结束时，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深刻认识，没有能够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采取了一些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和措施，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遭遇严重曲折。实践证明，只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据此提出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些认识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导致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也不能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更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第三，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大力发展生产、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度偏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忽视了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和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从而造成严重的损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只有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制定了宪法，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建立了大量的规章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来的，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不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认识上也不是完全清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违背人民民主的现象。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树立起法律的权威。由于民主和法制都不健全，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和打击，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甚至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遭到批判，错误的决策得不到及时制止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实践证明，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一级党组织和领导人都不能有超出法律之上的权力，各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五，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

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指导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受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加之封建专制主义的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邓小平后来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大力发扬党内民主，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第六，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历史总是在继承和超越中前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全盘否定和抛弃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果，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发生任何联系。相反，社会主义要体现出相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同一切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并提出要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实行敌视、封锁和禁运政策，加上我们自己后来发生的“左”的错误，导致我们一度关起门来搞建设，使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借鉴。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经验并准备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邓小平理论

立时代潮头，开改革之先。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民意，挽狂澜，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思想解放的滚滚洪流，冲开了神州大地创新创造的闸门，中国人民以昂扬姿态踏上富起来的新征程。当代中国为何能发生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如何改变了中国又改变了世界？新时期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需要到邓小平理论中寻找这一切的初始密码。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条件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后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尽管局部战争仍有发生，但短时期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长期被冷战阴云笼罩的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更加强烈。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各国人民更加珍惜发展的机遇，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求和平谋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还强调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时代的发展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发展，并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这就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2.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模式的弊端初步暴露出来；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也觉察到这个模式的弊端。毛泽东随即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些思想理论成果的产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份珍贵的思想财富，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时期，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这主要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和急于过渡；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这些失误的更深层的原因，一是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作出了错误的估量和判断；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也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某些制度和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和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进行深刻的反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这些错误，深刻地分析了它出现的原因，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

3.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群众的这种创造。他领导全党从总结群众的成功实践的经验中，也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开创性贡献。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全面开展和深入发展，邓小平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的科学论断。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理论观点。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概括。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概括，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轮廓的形成。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也逐步走向成熟。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四大报告还从九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强调“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四大报告系统阐释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认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十四大报告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论述了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的创立作出的独创性贡献。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十五大还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

三、邓小平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和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但毫无疑问这一制度已经初步地然而又是有力地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改革开放以来，他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在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经过深邃的思考，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突出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体现了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为回答资本主义严峻挑战所必须采取的战略决策。它突出地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

这一科学概括，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毫无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在改革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只能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的。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贯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三步走”战略，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国两制”、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搞革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着手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问题上，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使广大党员、干部转变了观念，统一了认识。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的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我们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本国情应该怎样认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又决定了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征。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和重大突破。

3. 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第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基本路线规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富强”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目标和要求，“民主”主要是政治领域的目标和要求，“文明”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目标和要求。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统一。

第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基本路线最主要的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答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保证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坚持改革开放”，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问题，体现了解放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道路。全面坚持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内在要求。

第三，“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有了这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必定能够胜利。

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目标的根本立足点。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方针概括到党的基本路线之中，不仅是改变我国不发达现状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定，是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出的科学判断，是党在新时期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既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要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党的基本路线高度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既紧紧抓住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又体现了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全面推动历史进步，实现民富国强、民族振兴的要求。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了基本路线。党的十九大进一步修改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不仅将“美丽”纳入了基本路线，而且将“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国”，扩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涵，提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

4.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

发展要抓住机遇。邓小平提出：“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必须正确估量国际环境对于实现我们战略目标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发展经济。

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邓小平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新论断，反映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势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邓小平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为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对西方的赶超，指明了方向。

5.“三步走”战略

在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1987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下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明确了发展方向，展现了美好的前景，成为全国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正如邓小平所说，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将完成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顺利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思想，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他明确指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要实事求是把握好速度问题。在中国搞现代化不能追求太高的速度，但速度低了也不行，凡是能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

为了顺利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还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提出，沿海一些地区要走在全国的前面，率先实现现代化，以更好地带动全国的现代化。内地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加快建设，国家要尽力支持内地的发展，沿海要注意带动和帮助内地的发展。对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要认真解决。合法的较高收入应予允许和保护，并依法加以必要的调节；非法的，必须坚决有效地依法处理。要承认不平衡，同时要从不平衡逐步达到相对的平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6. 改革开放理论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将把—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作为一次新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他在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指出还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一个大试验。改革中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因循守旧，四平八稳，不能不顾条件，急于求成。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开放也是改革，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只有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必要的互接互补，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自力更上不断创新，才能赶上时代，赶上当代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它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

实行对外开放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发展，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对外开放要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开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但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市场和计划的矛盾愈益显现出来，成为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和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事实说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正是这十多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我们取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共识提供了实践基础。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的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党的十四大根据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特别是1992年初南方谈话的精神，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要点有：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优势和长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所在。

8.“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他多次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他鲜明地指出，必须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一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围绕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

邓小平理论不仅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还提出了其他一系列两手抓思想。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总结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民主要法制化，法制要保障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统一。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提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邓小平的一系列“两手抓”，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有利于克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为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实了新的内容。

9.“一国两制”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面对港澳台地区尚未统一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坚持一个中国，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两制并存，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高度自治，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不同于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高度自治权，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各种合法权益将得到切实尊重和维护；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邓小平指出：“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实行“一国两制”，在中国的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局势可以长期稳定，有利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同时，也有利于香港、澳门、台湾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一国两制”的构想，体现了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一国两制”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顺应历史潮流，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国家必须统一，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国两府”“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都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我们的愿望，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的，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放弃使用武力，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只要台湾当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通过接触和谈判，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终归是可以实现统一大业的。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实践中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分别属于中国和英国之间、中国和葡萄牙之间的问题。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分别签订了联合声明，推动了港澳回归的历史进程。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既体现了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10.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要靠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

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邓小平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邓小平强调，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坚持党的宗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党章办事。健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保证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等。

邓小平理论内容丰富，除以上这些主要创新外，还有许多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如在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搞好部队的科学管理，提高正规化水平。如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主张国与国之间通过协商和平解决政治和经济的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处理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等等。

### 五、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一以贯之的主题。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理论指导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的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邓小平理论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邓小平理论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如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重申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邓小平理论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检验，已经被证明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中国在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在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之际，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并还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仍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仍然在曲折中获得了发展，这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个难得的相对稳定的和平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使全球经济日益融为一体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蓬勃发展，它是当今世界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和科学技术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异常迅猛。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可谓日新月异，并且深刻地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并越来越在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对通过科技进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认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致和深刻，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也因此空前激烈。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党的阶级基础在增强，群众基础在扩大。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中，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进一步发展，这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我国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经济衰退、国内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部分国有企业发生较大困难、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发展经济与保持环境生态等重重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必须研究解决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应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经历了一个酝酿、形成到逐步深化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

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要求。

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对“三个代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

2002年，江泽民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提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我们党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

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首要任务。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关系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实施人才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只有大力推进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才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式重要。

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要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不断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敏锐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2.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弘扬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这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越是发展经济，越是改革开放，越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3.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根本的课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江泽民强调，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根本的衡量尺度，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要强大，体现优越性，关键在发展。

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都与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才能实现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到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江泽民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国家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

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江泽民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形成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丰富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到20世纪末，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这是一个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既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目标。这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目标。

4.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5.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江泽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他强调一定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党的先进性，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使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江泽民强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做到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毫不动摇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除了上面的主要内容以外，还包括关于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建立巩固的国防、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坚持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推进祖国完全统一，提出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的理论等。

###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接续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把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回应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新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 科学发展观

###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解决好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是对我们的重大考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依据。

2.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还要看到，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党带领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3.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进入新世纪，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各国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大国关系深刻变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同时，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科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善于从国际国内因素的发展变化和相互影响中把握发展全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的环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就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发挥比较优势，把握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概括。

1.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和前进的。

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善于抓住和用好机遇。

实现科学发展，就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人民群众，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坚持以人为本，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强调，要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3.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中的“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

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领域协调推进

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坚持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

4.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深刻揭示了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是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关系的方针原则。

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加自觉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

坚持统筹兼顾，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坚持统筹兼顾，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各方面的发展需要，正确反映和兼顾各阶层各群体前利益要求。

坚持统筹兼顾，要牢牢掌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统筹兼顾的本领，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还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做到兼顾各方、综合平衡。要深刻认识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坚持实现阶段性目标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 三、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2.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好、发展好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包容性。

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既要从“大社会”着眼，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又要从“小社会”着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5. 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科学发展观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6. 关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科学发展观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自觉、主动、持续地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除以上主要内容外，科学发展观还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这些重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在内政外交国防领域的运用和展开，它们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四、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1.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接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探索基础上，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必然结论，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个精神实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联系。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着共同的时代课题，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都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都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都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理论主题、思想基础、政治理想、根本立场上一以贯之。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新境界，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2.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基本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科学发展观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昭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各方面建设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发展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